

# 生命力在历史背景下的强悍展示

□汪守德

读完浦子的长篇小说《独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仿佛被一种回味无穷的绵长余韵包裹着。许多通往历史的作品常常含有某种让人掂不动的重量,《独山》也是如此,它使作品展现的时空和我们阅读的感受,都变得如此的沉郁、深邃而苍茫。作者因其自身所独具的生活积淀,锁定了这个叫独山的地方,为我们掀开了一页页古老而新鲜、生存与毁灭、血腥而温存,至今仍令我们心与其谐、感慨万千的历史,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佳作便随之产生了。

任何一片土地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风云激荡的历史,坐落于浙江东部山海县这个“其貌不扬却依然独立”的独山,其历史也被种种不期而至的急风骤雨充斥着。小说以独山之下的王庄为圆心和坐标,以上世纪之初至新中国的建立历史为背景,演绎出这片土地上惊雷疾电般的历史与人生大戏,把原本这厢人们并不谙熟的生活,把似乎早已渐渐淡去的历史,再度拉入现代人的视野,给人们提供回望、品咂和审视过往的一斑澜阔大的画幅。当其一点点展开时,令我们惊心的是这座海拔并不很高的普通山丘,以及发生在独山脚下的世道与人生,竟都遍布着无数生生死死、血泪交迸、令人错愕的历史场景。独山所带有的平凡却伟岸的强烈象征性,使之矗立为值得仰望的文学景观。

小说从寡居的王玲娣雪地背人的事件切入展开叙事。行走于风雪之夜的女主人公显然是世间善者与众者的化身,但那具浑身赤裸的男性躯体神秘地出现与离奇地消失,以及她其后常于无人之时一次次背人动作的演示,使人物的施救善举带上强烈魔幻色彩和性的猜想。这一偶然性事件反映了人物性格与品行的必然性,并成为小说发展的重要结构和线索,即既有与先从教后为匪的郑西凤

的情感纠葛,铺排出一连串发生在王庄及学校的纷纭故事;又因往昔有恩于与山海县符知事及木子县长而产生现实的勾连,使叙述得以从独山、从王庄向更大的时空伸展,小说也因此有了更强的张力、更广的向度。

然而小说真正的主角却另有其人。作品以主要的篇幅与笔墨来塑造其侄王传达这个人物。遭遇出没于山林的牛魔王之类绿壳(土匪)的绑架勒索,果断地卖房卖地、毁家纾难,又殚精竭虑地使家境重归兴盛,更在种种风雨与坎坷中手脚并用地苦撑危局,这一切构成其起伏颠簸的生活实况和复杂曲折的历史命运。在这个人物身上,小说揭示和背负的是作者对于民族性格的观察与思考。王传达的博大宽厚、坚韧包容的性格特征,表明他在一定历史时期既是家族的脊梁与支柱,又是社会和精神的 中坚,他身不由己地被一次次推向闪烁着血光的漩涡与刀锋,然而他不得不或处之泰然,或绞尽脑汁,或遍体鳞伤地面对和承受。他是以柔性的性格和过人的智慧,来担当这种必须担当的历史承载,来显示和证明其内在坚硬的性格质地,使之有时看起来似乎如置身砧板任人宰割,柔弱无骨,没有棱角,不堪一击,其本质却是强悍不屈,蓄积和贮藏着民族精神、性格和文化的最为本原性的力量。王传达所代表的,是置于刀枪之外的另一种维系和书写历史的力量,更为深厚长久,因为原本貌似强大者纷纷凋零,而他却经磨历劫巍然依然。

小说围绕人物展开的是对历史具有立体感的描写,连绵的社会动荡,家族的纷争,土匪的肆虐,以及人事的更替、商运的难测、敌寇的入侵等等,构成了历史、世相、人性的多样侧面和无尽变数。我们从小说读到的历史生活,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也从不按

预设的轨道运行,伴随着温婉多情的眷顾与慷慨,伴随着波诡云谲的勃兴与衰微,伴随着猝不及防的杀戮与血腥,历史的风云时来时缓地变幻着,人生也在高处与低处频频转换轮回,有时甚至让人像坐过山车那样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生命在其间的经历,或如花朵般盛开,或如叶片般凋零,从而拼贴出以独山为依托的我们民族光怪陆离、扣之心惊的生活史、风情画和心灵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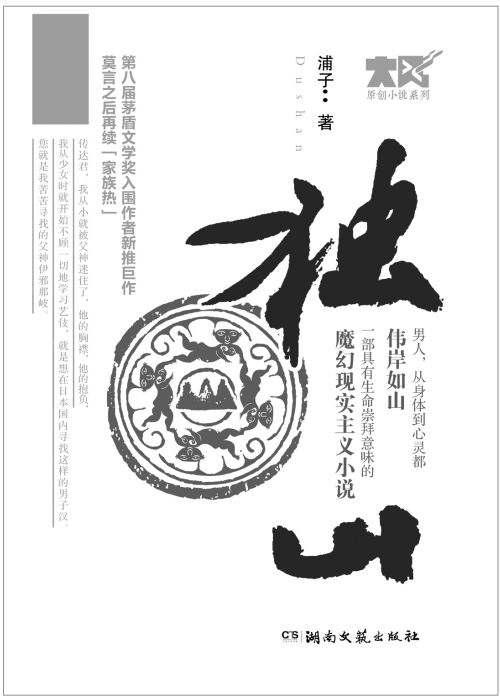
对于民族蓬勃生命力的揭示,也是小说一个显在或暗喻的主题。历史的延续既是生命的和肉体的,也是道德的和精神的。王传达作为其父王世民的传人,所传承的不仅是家族的血脉和丰盈的家产,更是生殖和生命的旺盛能力。小说在竭力描写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冲突、人物性格纠葛的同时,也着重表现了父神崇拜和生命强力的内容。这些曾被目为荒谬而遭驱逐的东西,其朴素原始的精神依然扮演着历史的角色,给人注入不容忽视的能源。并非是小说为趋时随俗而添加的佐料,使作品因情色而诱人,其努力与匠心显然是要让其回归民族曾被极度扭曲的本位。独山女性世界对王世民男性能力的记忆,已经成为令人回味和向往的传说,这不仅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表达曾是讳莫如深的崇拜与迷恋,更是让其在坚硬的精神的看重与尊崇,以期复归民族之所以浩浩荡荡、生生不息的自然原貌与本性。小说借日本女工千雪对王传达伟岸如山及其胸襟抱负的痴情,以及其因绝望自杀的他民族的镜式效应,把这种生命意识强化到了极为显豁震撼的程度,从而具有惊世骇俗的文学力量。

小说令我们颇感迷惑又被深深吸引的是,生活总隐藏和呈现出许多使人料想不到的未知。某些超验现象与事实的存在,让人们

在生活中频频遇见匪夷所思、颇为魔幻的异像与事件。王玲娣神秘难解的经历堪称其中的典例,而符知事来自上海滩的娘舅之薄情寡义和六亲不认,却能凭空剪除飞舞土蜂的敏捷身手,就显得是那么六精八怪。尤为奇异的是王传达孙女婴翠的非常表现,其倔犟早慧已属异数,而其明明女孩身却顽强固执地要站立着撒尿,其乖张的举动不免叫人纳罕称奇。而她一次次过于老成地揭破成人世界的秘密,都使人企图追溯其血脉,想象和探究其源自何种不可知的、神秘莫测的力量,是怎样的机缘赋予其惊人的慧根和天眼。小说对此并非采用过分刻意、过度夸张的手法加以宣扬,在其看似平淡质朴的描写中,这一切仿佛都是随生活的流动而自然发生的,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作品借这类奇事的讲述,反映出历史与生活本身真实的诡异与神奇,也使作品具备了别样的意味。

小说对历史的还原与虚构,体现在所编织的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我们从作品的叙述中重历了识别那一时代中国乡村纵横交织的种种元素,当其像潮水漫来、像狂风刮过时,在独山、在王庄、在 山海激起的都是非同小可的喧哗与躁动,也使经过作者提炼与压缩的生活具有了浓烈传奇色彩的韵律。无论是对土匪内部争斗的描写,还是王传达和王传本本家的兄弟心机暗藏的算计;无论是山海县时令的变化,还是王庄遭遇的各种风波;无论是各种人物的突然故去,还是王德青对凤仙与凰妹姑辈乱伦式的嫖宿,都表明历史与人生在其难控的流向中,表现出本身的某种无常与难测、悖谬与荒诞,仿佛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并且鲜活地存在于岁月的迷雾中。

小说是对作者想象力与叙述能力的挑战,而浦子始终以平静的叙述节奏,常常掀起意想不到的波澜,告诉读者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人物,怎样按自身的逻辑与规律向前,演变出不可预知的过程与结局。白描是作者常用的手法,因而小说的故事密集而洗练、生动而深邃,使这部篇幅并不算很长的小说,有了较高的质量和足够的重量。



声中颓然倒地,暗示着她的实验与这块土地的隔膜。而玲娣的这种隔膜,则又传递着王传达与这块土地的无间与和谐。

事情还不仅如此,为了完美呈现寄寓在王传达身上的理想精神,作家不仅将家族矛盾推向极致,不仅将王传达放置在正邪对立、官民对立、新旧对立等一系列矛盾中,而且还引入国族矛盾——把王传达放置在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时代洪流中,放置在他的昔日同窗好友变成今日民族敌人的情感纠结中,放置在他与千雪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中……

正是在国族矛盾的发酵中,在他与千雪的灵肉冲突中,王传达身上所凝聚的绵长生命力,他对这生命力的无尽持守,才得以尽情释放,作家在他身上所寄寓的理想人格和民族精神也才得以全面展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想人格和民族精神的根源,也才得以水落石出。

这理想人格和民族精神与新思想有关——王传达年轻时曾周游世界,学习新思想,锤炼新精神;这理想人格和民族精神与传统思想有关——王传达不仅趋向新思想,而且自幼年时就是传统思想的学习者和继承者,这从他对儿子德青的教育可见一斑;然而,归根结底,这理想人格和民族精神却根源于独特的地域——独山,根源于独特的民间文化——浙江宁海的民间文化,作家老家的民间文化。这集中体现在小说第十章王传达在与日本同窗藤木——他的侵略者面目尚未显现——的对话中。在对话中,这偏居浙江一隅的山,与日本的国家象征富士山并举,超越地域,具有了宏阔的力量。作家如是描述独山:“眼前看见四周皆高山峻岭,惟独这一座小山,处于平野之中,却平生一种崇高与威严。”越走近它,这种侵略尤甚,就如走近火,走近神”。

这独山,不正是王传达的化身吗?或者说,王传达所象征的精神品格,这品格所象征的民族精神,不正是独山那如火如荼的品格吗?

由是,《独山》可谓一部向民间致敬、向乡土致敬的长篇佳作。

# 向民间致敬 向乡土致敬

□鲁太光

沉潜五载之后,浦子再次推出长篇新作。无论从题材内容上看,还是从审美品格上看,《独山》都可视为其长篇幅处女作《龙窟》的姊妹篇,是其再次以深情有力的笔触结构的一部向乡土致敬、向民间致敬、向文化致敬、向生命致敬的长篇小说。

由于小说的核心情节主要集中在王庄的两大家族——王传达家族和王传本家族几十年的博弈之上,因而,小说很容易给人以家族叙事的传统印象,然而,这部小说的内蕴却远远超出家族叙事的范畴。不过,要想清楚地阐释这一切,却必须要对小说中的家族叙事做一梳理,因为,小说中的一切,的确根源于家族叙事,或者说,正是在家族叙事的基础上,才萌生了小说的其他叙事线索和文化主题。

小说的家族叙事始于王庄老一代的故去和新一代的登场。在小说如梦似幻的开场中,在小说主人公之一玲娣如谜语般的行为中,我们进入了王庄的核心地带——族长公世利家的道地。正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了王庄的“脊梁”王世民故去的消息。而且,伴随着这消息的流布,不久之后,王庄的另外两位“权威”翠香和世利也与世长辞了。然而,与其说这是“告别”的时刻,毋宁说这是“迎接”的时刻。因为,几乎在这三位“老人”故去的同时,三位性格更为鲜明的“新人”王传达、王传本、玲娣就在王庄登台演出了。这意味着,在王庄,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新的一页开始了。

王庄的“新纪元”是在王传达和王传本的角度中展开的,是在王传本向王传达的无边攻击、在王传达对王传本的无尽忍让中展开的。小说伊始,在王传达刚回理了父亲王世民又埋葬了母亲翠香,浓重的悲伤仍然笼罩心头之时,王传本就勾结山上的绿壳(土匪)绑架了他,而且将他送入城中的群芳楼,企图以美色引诱他,毁坏他的美名,人算计失败之后,又让绿壳严刑拷打他,企图以暴力摧毁他的意志,而且还暗中做手脚,侵占了王传达的全部家产,让王传达成了他的“佃户”,成了他的“租客”,试图以贫贱羞辱他……但对这一切,王传达却泰然自若。小说中局,当形势逆转,王传达咸鱼翻身,再次成为地方精英,王传本家道中落,落草为寇,成为绿壳首领,他们之间的“竞争”也从家族之争转换为正邪之争时,王传达依然以德报怨——在世外高人、符知事的娘舅从大上海赶来协助符知事剿绿壳,而且设计使绿壳陷入绝境时,王传达却将解药给了绿壳,放他们一条生路,甚至在符知事调来正规军,就要将绿壳一网打尽时,又是王传达网开一面,悄悄将消息透露给他们,让他们突出重围,王传达的这一举动,却导致了清廉有为的符知事含冤而死。小说终末,在王传本归顺地方,成为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而王传达则成为县会议长,他们之间的“竞争”也转为“政治竞争”时,王传达依然屡屡以德报怨,宽恕王传本,原谅王传本,甚至扶助王传本,放纵王传本……

表面上看,王传达和王传本的举动都是如此的不合情理,王传达和王传本的关系也是如此的不可能,然而,恰恰就是在这种不可能和不合情理中,恰恰就是在这种扭曲的相互关系中,蕴含着作家所要表达的最大合理性,因为,归根结底,家族

不过是作家结构小说的叙事线索,尽管这占据了小说的绝大多数篇幅,而作家结构小说的核心目的,在于寻找,在于寻找一种理想的人格,在于寻找一种理想的民族精神。而且,在作家看来,这种理想人格,这种理想的民族精神,就蕴藏在王传达身上,蕴藏在他的一举一动中,而王传本变本加厉的诡异行为,则不过是一种催化剂,是为了使王传达的理想品格绚烂地绽放开来。

在小说中,为了使王传达所寄寓的理想品格绚烂绽放,作家不止添加了王传本这一种催化剂,而是添加了多种多样的催化剂。

这催化剂是他故去的父亲王世民。尽管在小说伊始,这位《龙窟》中的主角就与世长辞了,但在小说中,通过众多人物的转述,他却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了左右小说叙事方向的“缺席的在场者”。通过众多的他者之口,通过众口一词的赞美,我们知道,在小说中,王世民之于王庄的意义,之于独山的意义,主要在于他强健的生命能力,或者说,在于他强劲生殖能力。这使他成了被崇拜的生之图腾。与父亲的强悍相比,王传达似乎是软弱的;与父亲的强壮相比,王传达似乎是无能的。这一切,都表现在他在众多的美色面前的持守。然而,如果纵览王传达的一生,我们会发现,这种持守,不仅是作家对王传达的放低和缩小,反而是对他的另一种褒扬和放大,因为,如果说在龙窟时代这种放达的生命力是王世民开疆拓土的工具的话,而在独山时代,这种持守的精神品格则是王传达守护生灵的法宝。

为了清晰地传达这一点,作家不仅将王传达与其父相比,而且还将他与其子相比。在小说中,王传达之子德青之行为举止似乎更接近其爷爷王世民——他血气方刚,青春孔武,欲望勃勃。然而,正是这蓬勃的欲望,使他成为王庄的家庭破坏者、伦理破坏者,甚至成为秩序的破坏者,尽管他觉悟后,又极力修复这一切。不仅如此,作家还将王传达与其孙女婴翠相比。就在王传达“委顿”之时,作家推出了婴翠这个奇女子,这个可以站着撒尿的女子,这个可以通灵的女子,这个风风火火无所畏惧、无所不能、无往而不利的女子……这似乎暗示王庄生命力的萎缩,暗示王传达的萎缩,然而,从深层次上看,婴翠的“异军突起”,不过是为了衬托王传达生命力的内敛绵长。而且,即使从小说结构上看,婴翠也是一个“未完成”的人物,尽管这不一定是作家的有意而为,但这似乎暗示着,她不过是王传达的一个补充。

这催化剂还有玲娣。在小说中,玲娣是另一个理想人物。小说开篇,这理想色彩就表现得格外明显。她“负重前行”的忍者形象,甚至成了结构小说的另一条线索。不过,如果结合玲娣的身份和经历来看,她的“负重前行”不过是一种隐喻。她在王庄兴办新学,她在王庄传播理想,她在王庄背负光明,不过是想在王庄建立一种新的理想秩序,培育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这来源于她在上海所接受的现代启蒙。不过,就在事业即将达到巅峰时,就在“背负光明操”即将在王庄推广时,她在二狗索要金钱的声音中,在小女孩婴翠对背负光明操类似皇帝新装的评判

就有了。公社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在全公社找有写作能力的人,我被选中了。当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十分激动,竟然说,“好,我要做一个作家。”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一个电影放映员如何与作家联系在一起?可当时我确实是如此说的。而母亲告诫我,要认真。

母亲的话,与我想当作家的话,拧在一起成为一根无形的绳子,一直牵引着我。

放映电影是晚上的活。白天的时间我就用来看书和写作。尽管当时写的是幻灯片里的宣传词,我却是在当时县里为数不多的幻灯片宣传高手之一,在市里、省里获过奖。

后来在恢复高考后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家汽车驾驶技校。毕业了在长途汽车站度过了长达15年的职员生涯,但始终没忘了当初的选择。先是在乡村客运汽车上当售票员,后来在几个汽车站当业务员;售票,指挥乘客进出站,指挥乘客上下车,后来在货运站当调度员,最后在公司办公室当了文秘。但不管在哪个场所,都是书不离身,笔不离手。终于,有小说在《西湖》《东海》《萌芽》《江南》等杂志发表。后来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小说时,在小县城文化引起一阵震动。

## 创作谈

□浦子

因此进入县报社,进入县机关的报道组和宣传部,似乎是与文学更近了一些。这段时间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文学作品,却始终觉得那些是准备,就如登山运动员在攀登高峰之前的准备。第一部长篇小说《龙窟》的创作,从构思开始到写作完成,用了6年时间;第二部就是《独山》,前后用了4年,其实准备时间是几十年。可那几十年,不仅仅是为《龙窟》和《独山》,还有计划中的作品。

几十年认真准备,就为的是一件事,我以为做任何事都能做成的。这确实,是人生的态度。它决定了人生的色彩,也决定了我作品的色彩。

我一直在一个小县城工作,离我的出生地冠庄只有10华里。近年县城扩张,冠庄也就算了城区。所以,我在这里出生长大,直至人生的壮年,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写作,一直没有走出由

# 这本书,我非写不可

□浦子

两边群山夹峙如小拇指般狭长的小县城。以往,我一直有寻找中国文化中心并在那里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打算,这也是多年来困扰我的人生困惑之一。可是,事与愿违,我就一直在原地没有向外挪动半步。然而,天长日久,我心中渐渐有了疑问:中国的文化中心到底在哪儿?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还是首都北京,抑或以往的南京、杭州、开封、西安?

与现代城市作家比较,县城作家虽在结交文友、信息的获得、作品传播推广上有些不利,可少了文友,也少了圈子,就少了偏见,大了观察世界的视阈;少了文坛上常见的某些虚荣,更可潜心读书和创作;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普及,信息的获得不再是短处;加上接近基层接近生活,有更多的地气滋养,有更多的灵感和创造力。

解除困惑的时间应该在创作《龙窟》之前。所

先看“后记”。“后记”是作家对个人经历或这一部书的自白。浦子在其新著《独山》“后记”里说,自己就在独山脚下“学习、生活、工作,一直没有走出由两边群山夹峙如小拇指般狭长的小县城”。在写作的时候,“我把文字组成一个王国,这个地方就是天下的文化中心。虽是虚拟的,却给人以重要的寄托”。

可见,浦子乃独山之子,有资历有能力为生他养他的这个地方写志书和史记。5年前写《龙窟》,这部《独山》是《龙窟》“在时间上的延续。时代改变了,天不变,地不变,人亦不变。我如佛如神如上帝,观照着这些芸芸众生。可佛如他的命运不是我掌握的,掌握在人物自己手里……关于这部书本身,我不想在这里谈”。

而我没有看过《龙窟》,从“后记”又未能获得有关这部书的信息,只好作为独立的长篇来读。封面封底的导言指出,这是“一部具有生命崇拜意味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的坚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于是,开篇,“宣统三年的正月初一”,一个女人背着一个光身男人走进王庄……

“魔幻”随即出现,这女人实际上并没有背什么,只是幻觉。早年,玲娣崇拜长有硕大阳具的世民。得到世民哥帮助,这个“没半点见识的浙江山角落女子”,才得以“走出几千年尘封的山村”,如今回乡,她成为山海县王庄镇小学的校长。幻觉萦绕,以致在醉酒中被教师郑西凤诱惑成奸。清醒后,她驱除了这“畜牲”。

郑西凤妻原是群芳楼的妓女赛美玉,他之所以诱惑年龄比自己大的玲娣,为的是骗取这“傻女人”从上海外国义父那里得到的遗产。郑西凤是个十足阴险的骗子,此后有关他的细节和心理,一笔笔勾画出他邪恶的嘴脸。但当时,离开王庄小学,郑西凤跑到了哪里?赛美玉几次找他都没有找见,作品至此,又设置了一个悬念。

小说需要悬念,长篇尤须悬念不断。如果说“魔幻”形成的悬念,读者听之任之,那么情节设置的悬念,则凸显作家的艺术功力。如果说“下回分解”吊人胃口,那么“暗度陈仓”更能惊人魂魄。《独山》的悬念,也就是“暗扣”。在赶走郑西凤的过程中,便埋伏下了幽深的奥秘——王传本给郑西凤“指了一条生路”。

作品以玲娣开篇,但全书的主人公,是现已成为家族长辈的王传达和王传本。这两个师兄弟的生命历程,演绎了民国时期山海县的人情风物。玲娣的生命,在符知事因“通匪”罪被处决后已走到尽头。人物性格决定命运,她沉迷于“背负光明”,在这种神圣的操作中去世。临终前,王传达告诉她,是自己害了符知事。

当初,牛魔王把王传达绑架上山,但他坚决不肯出任山寨的首领。为了赎他,家人把产业卖给了师弟王传本。半年后,兄弟俩对饮谈天,传本顺口说到“爽快”,使传达“怔了一下,恍然想起在山寨里听到过类似的声音”。看到此处,我也曾“怔了一下”,意识到这一笔“爽快”,很可能是作家暗暗编织的一个情节“纽扣”。

第三章开头结下的这个“纽扣”,直到第五章才豁然解开。而第四章,风水流转,已是民国二十四年,一场大火把王传本的商号烧个精光。这期间,王传达已成为山海县首富。尽管破产,王传本照旧到幸免于火灾的群芳楼寻欢。此后,他竟也被山寨“绑架”去了。索赎款一万元,他的家人跪求王传达出钱搭救师弟弟。

看过第五章,我才清楚,王传本原来跟山寨早就有勾结,这一次他进山,便是用王传达交付的赎金,当上了土匪首领。作品细致描绘了匪徒结伙的情景,给读者提供了山寨生态的画图。书中所写妓院的笔墨,何尝不是花花世界的留影。作家以熟悉的独山为依托,虚构出一系列独特的人物和奇异的故事,夺人耳目。

追根溯源,实际上是王传达违反了符知事,两兄弟跟山寨和妓院都有着密切关系。后来,民国三十年,日寇侵入宁波,他因送日本同学一只“祖传尿壶”,险些被当成汉奸枪决。王传本救了,却又说:“杀你没了对手,我活着没意思。”再后,民国三十四年,日寇占领山海县,他自愿当商会会长,以此挽救了一批商人性命。

诚然,王传达的生命力是坚韧的,历经岁月风霜雨雪,他从民国伊始活到了民国结束。1949年6月1日,“永远记在了山海县历史上”,因为,这天,“国军”活埋一批村民,他“为民请命”,到独山脚下去责问“团长”,被勒动兵枪杀人。这样的结局表明,坚韧的生命力却也是脆弱的。事出偶然,便轻易结束了他的一生。

与人的生命力相比,恒久蓬勃旺盛的是天时和地域。人们享用着地域的润泽,同时不得不承受着天时的束缚。每一片乡土特有的景色,每一个时期命定的时刻,都有待关注着天地人的作家给予心血凝聚的文字记录。文学的使命,就在于把正发生或已过去的雕刻下来流传下去。浦子,便是这现实与历史的“书记官”之一。

小说各有路数,浦子的风格是在“半梦半醒”中漫游。他自认为并实践着:“创作与梦很近,没有理性可言。如果有理性,那也是将这些梦渲染了文化。”《独山》就是这种乡土文化渲染的长篇,无需完整故事,也不必让人物按故事的轨迹行动。它谱写的,就是与作家相依为命的特定的生存环境之中的特殊文化风情。

每一位真正的作家,都是在为自己生命历程所见所闻所感撰写史记和地志。浦子正是如此,他为“如小拇指般狭长的小县城”留下了艺术的画卷。不久,他将奉献“王庄三部曲”第三部。当然,即便此后另写其他内容,他笔下的“王国”,也仍将是“天下的文化中心”,他依旧会“如佛如神如上帝,观照着芸芸众生”。

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我把文字组成一个王国,这个地方就是天下的文化中心。虽是虚拟的,却给人以重要的寄托。这种寄托延续到本书的创作,乃至以后的创作。

我特别会做梦。只是觉得我一辈子做了无数次梦,几乎每晚做梦,就是午休,有时候也做梦。而且,我在梦中看到的景物是彩色的。小的时候,有一次生病,我曾经产生过一次幻觉。大白天的,我躺在床上,竟然看见对面母亲的床上,有一只鸽子正在熟睡的母亲脸旁边,并用喙轻轻碰母亲的脸。我和妈妈说,妈妈说,哪有鸽子?是你病了,发烧好几天了。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果然烫烫的。我不是心理学家,不知道梦与幻觉之间的关系。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梦见自己的左手臂上突然有了隆起,隆起的肌肤竟然破了,有一只乌头钻了出来,继而,整个乌身钻了出来。而且,不是一只,而是好几只,一脱离了手臂,乌鸟呼扇着翅膀飞走了。我把这个梦作为一个人物的细节,如实记载在本书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醒着的延伸。文学是梦的延伸。

这部作品是在《龙窟》时间上的延续。时代改变了,天不变,地不变,人亦不变。

□崔道怡

民国岁月  
山海风情